

唐锡彤 刘晓焕 吴德运 主编

下
册

吴佩孚新论

吴佩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晓焕 吴德运 主编

吴佩孚新论

下册

——吴佩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吴佩孚评价之我见

吴佩孚 1874 年生于山东蓬莱,1939 年在北京去世。吴佩孚是清末秀才,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称他为“学者军阀”。众所周知,1923 年他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造成著名的“二七”惨案,并抵抗北伐运动,兵败后蛰居四川,“九一八”事变后伏居北平。对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吴佩孚的评价,应该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根据吴氏的现实表现,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而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

一、民族主义情结

我们通过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察,结合吴氏在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既有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性的一面,也有在客观上推进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面。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析。

清朝时,年少的穷秀才吴佩孚在家乡的蓬莱阁前看到了被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炸毁的楼宇,愤然写下了“何日提劲旅,收复旧山河”的诗句。

1917 年,张勋复辟,段琪瑞和曹琨都发兵讨伐,第一个攻入北京的就是吴佩孚团长。吴佩孚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相当拥护的,他心里有的大汉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容忍满清复辟的。在护法运动中,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战场上接连攻打护法军获胜,但因其与段祺瑞矛盾的激化,而对护法军作出了让步,罢战主和,并

通电全国主张“南北议和”，支持孙中山，而获得社会舆论的好评。而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某些表现，则更说明了他的民族意识。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都是知识界和一般民众爱国热情的爆发，而忽略了军人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主权。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支持，在军界中，吴佩孚就是一个支持者。运动爆发时，远在湖南的吴佩孚直接给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后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他说：“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山东家乡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并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这就是吴佩孚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而吴佩孚等军界诸侯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是决策。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反直“奉皖孙”三角同盟惨败，于是苏联人在拉拢广州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拉拢吴佩孚，两次表示愿意出钱出顾问帮助他。但吴佩孚和一拍即合的国民党不同，他觉得，苏联人的赤化终究会摧毁儒家的中国，而且他更不愿失去外蒙。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孙中山的支持。

吴佩孚通电保护故宫，更是显示了他的民族情结。当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远在洛阳的吴佩孚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电文掷地有声：“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

免一劫。

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开学练兵，对着一群年青的学生大呼：“我要把你们培养出一百个将军来，把中国失去的土地都收回来！”底下的青年学生大呼“大帅万岁”！1932年，西北五省的军阀联名上书，推举吴佩孚出山领导对日抗战。吴佩孚也表示要：“舍此残生以御国辱。”

二、“三不主义”信条

董必武对吴佩孚有过这样的评价：“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设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而吴佩孚的“三不主义”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不借外债。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主要是依靠外债维持着。直系军阀获得了英美的支持。但吴佩孚一生都没有向外国人借过一分钱。真正获得过英美支持的是直系中的冯国璋和孙传芳，吴佩孚是军阀中的例外。

不入租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败给了张作霖和冯玉祥。部下劝他到租界里躲躲，他不听。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蒋介石劝他南下，他回电说：“世上有桃源则去，未有则不去。”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不去。1938年，曹琨病死在天津法租界，他不愿自毁誓言，只在北京设灵堂祭奠。

不纳小妾。吴佩孚辉煌后，始终不肯抛弃其糟糠之妻。更难

能可贵的是，两人无子女，其妻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不从。1922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向他当面求爱，被断然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英雄主义本色

饱读诗书的吴佩孚在卧室中，用悬挂着自撰的联语自律：“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吴佩孚的确是这么做的。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对日本的侵略罪恶，吴佩孚是深恶痛绝的。即便流落四川有东山再起之意时，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他拒而不受。就在张学良到北平火车站来迎接他时，他质问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为何不抵抗。不久又通电揭露伪满洲国成立的本质：“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当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为表示抗议，他整整绝食一天。

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1937年北京被占领了后，身在北京的吴佩孚就更加显眼。日本人制订了“南唐北吴”计划，要其出山，但吴佩孚表示，日本人不撤兵就不从政：“我文天祥还是做得了的。”1938年，汪精卫投敌后，日本人又指定了“汪吴计划”，并派汪大汉奸找他协商事宜，吴佩孚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和汪精卫见面，回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真是对汉奸的绝好讽刺。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他给蒋介石发电报表示祝贺，并希望再接再厉，光复山河。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

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伪政权军事首脑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日本人急忙封杀报道，但还是有一家美国报纸报道了。

恼怒的日本人终于绝望了，这位中国将领断乎不会屈服了。

四、历史的评说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理”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曹琨、吴佩孚、孙传芳）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炕，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其实，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确实原因就是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他的很多做法很像矜持自傲的关羽。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决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入主中南海后妻妾满床，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在洛阳）也不愿“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此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1924年，当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又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

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这就是吴佩孚,一个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军阀,一个有着民族主义情节的军阀,一个有着清廉名的军阀,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

李鹏程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略论民初吴佩孚与教育界的关系

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作为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的吴佩孚,曾经与教育界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由热转冷的过程,即从五四时期的互相欣赏,到 20 年代中期发展为互相批评。

一、五四时期的吴佩孚

五四时期,吴佩孚曾以进步、开明的姿态出现,数次通电,力主拒签和约;斥责当时当权的皖系北京政府卖国,公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他的言行受到包括教育界在内的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赏,认为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军阀武夫的青年将军。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吴佩孚上升为北洋军阀中颇具影响的人物。

五四时期,吴佩孚正在湖南,但他关注时局,频频通电全国,对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呼吁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学生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各地群众为声援北京学生,纷纷上街游行、请愿,控诉政府的暴行,请释爱国学生。在此革命狂澜中,吴佩孚作为政府派往前线带兵的大员,却站到了干预朝政的学生和民众一边,为学生运动辩护。九日,吴率所部第三师全体官兵连发数电致北洋政府及全国各省各界。他在电文中疾呼:“窃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

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可想见。”“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①不仅为学生辩护,他还委婉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舍,铜驼荆棘,坐视沦管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之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②。吴佩孚请求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民气而救危亡”^③。

七月一日,吴氏联络李奎元、冯玉祥、谭浩明等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鸿自杀也”,“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制后盾,愿效前驱。”^④在“五四”风潮中,吴佩孚是相当活跃的,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而且旗帜鲜明,其通电的内容与“五四”风潮的方向一致,对督促政府让步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五四期间,正在湖南的吴佩孚还与湖南教育界产生实际接触。当时,由于段祺瑞的亲信、反动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暴虐统治,湖南省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包括教育界在内的湖南知识界也是先锋,他们深知吴佩孚与张敬尧之间矛盾颇深,并鉴于吴佩孚对国家面临的外交危机态度开明,因而采取了“联吴驱张”的策略。湖南学联派代表到衡阳,上书请愿,在吴佩孚面前痛切陈词。吴氏初见学生代表,继见全体,称叹不置,并鼓励中等以上学生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到妇女界做广泛的社会宣传,挨户讲演,“使一般太太小姐们,略懂点国事”^⑤,表现的颇为开明。不久,吴便电张,劝其释放学生,告诫他“勿为已甚”,并向曹錕

①③ 《吴师长佩孚通电》,《大公报》1919年6月11日。

②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51页。

④ 同上,第354页。

⑤ 《时评》,《民国日报》1920年5月1日。

发出密电,言“勋臣(张敬尧字)輿情不洽”,要求将张他调^①。张敬尧在社会舆论及吴佩孚的压力下,只好被迫让步,释放了被押学生。吴佩孚为表示自己支持学生驱张,还捐光洋百元,资助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湖南学报》,并最终配合湖南的革命派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吴佩孚因而一度蜚声于湘省各界,学生誉之为“寄身军旅,为国勤劳”之革命将军。

虽然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行为,有其作为在野的地方实力派的个人私利考虑,有装点门面、利用民意的意图,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此般表态,在当时的军阀中仍属罕见,与媚外的皖系和其他颞预无能的军阀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推动五四运动向有利于国家、民族方向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所以五四时期吴佩孚受到包括教育界在内的举国舆论的一致好评,在民众眼里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将领。时人评论道:“如果南北大多数军人都有这样的表示,那北廷则要卖国,恐怕也没有胆量来实行。可惜一般军人还如做梦一般,没有觉悟,所以北廷竟肆无忌惮了。”^②蔡和森当时指出:吴佩孚在五四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象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③。青年毛泽东也称赞他“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④。时人称赞吴“赤诚爱国”“大义昭然”^⑤。

在吴佩孚与教育界关系和谐的表面现象下,其实潜藏着双方在思想理念上的巨大差距。具体分析吴佩孚在五四时期对学生运动的表态,可以看出充满了儒家传统气息,是儒家民本思想、士大

① 丑伦杰:《驱张运动在衡阳》,《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

② 《时评》,《民国日报》1919年6月28日。

③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9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09页。

⑤ 《津代表致吴佩孚电》,《民国日报》1919年9月15日。

夫精英观念和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与青年学生受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其实是有深层次的不同的。双方只是在国难当头的现实环境之下,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短暂相互认同,此后随着时局的变迁,双方之间理念上的深层差异逐渐显露出来,双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冷淡。

二、索薪运动中的吴佩孚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作为全国教育界旗帜的北京国立八校又带头发起了向北京政府的索薪运动,索薪运动中北京教育界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独立性、组织性和斗争性,以上书、请愿、罢教等方式与政府之间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与政府方面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是在这次政教双方的博弈中,吴佩孚对教育界的态度就发生转向,明确表示对于教育界的自由风气表示不满。

20年代初教育经费短缺的直接原因完全在于政府方面——军阀割据、财政管理混乱、庞大的军费开支占用大部分教育经费,北京国立八校经费的短缺甚至还有北京政府因五四运动而故意报复教育界的原因。索薪运动中北京政府敷衍、搪塞,几乎等同于无赖的所作所为,证明政府对教育持一种漠视或无视态度,这是推动教育界与政府走向决裂的催化剂。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教育界对此很清楚,从1920、1921年的两次北京国立八校的罢教来看,教育界对政府最初是抱有一定的期望和信任的,与政府的交涉方式也以温和的陈请、上书请求体恤为主,对政府能“容纳”教职员的意见表示感激。而且从教育界当时单纯的索薪目的本身来说,教育界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政府能保证有较稳定的经费投入,或国家处于非常状态下,深明大义的教育界是可

以在经费问题上让步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得到了印证,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基本有所保障时教育界的风潮就不太激烈,抗战期间教育界更是甘愿与政府同舟共济、勒紧腰带支持政府抗战。20年代索薪运动和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之所以越来越激烈完全是政府当局一再食言,践踏教育的结果,教育经费环境的一再恶化才将教育界逼上了与执政当局对立的位置。

20年代初北京政府与教育界之间的关系疏离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其中可以反映出教育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般性问题,索薪和教育界提出的教育经费独立诉求背后蕴藏着现代教育理念与专制政治之间深刻的冲突。吴佩孚在1924年对教育界的一番表态正说明了军阀武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在根本价值判断上的差距。

“吴使对于北京教育界,多不满之言辞,尤以学生动辄驱逐校长反对教职员及教职员之组织联合会与政府对抗为最不满意,略以学生在求学时期,应尊敬师长,专心学问,今乃动辄干预外事,藉端好恶,拒迎师长,越出学生应守范围,匪独此风不可长,即于学生本身学业,亦大有妨碍。”“至于教职员,其职务原在授课办公,各尽其职足矣。今亦组织联合会,中小学有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甚至有公立学校之联合会,有私立大学之联合会,干预职务外之事务,结合群众,藉群力而与政府对抗,此等究是如何景象耶?譬如军队,我辈若为师长,而一师中之团营连排长有团营连排之各个联合会,尚能指挥钳制乎?此风实尤不可长也。我辈以此等不合理之举动,应即加以制止或纠正,而后办事不至棘手。”^①

在吴佩孚眼里,学生、教师各有其“本分”,如果学生、教师超越其“应守范围”,组织团体,干预“职务外之事物”,这都是“不合理”的、应加以“制止”的举动。其实这一时期,教育界的斗争形式、斗

^① 《教育界消息·呼吁无门之京师教育界》,《教育杂志》第16卷第10号。

争目标与五四时期没有多少不同,只是斗争内容不同而已,不是争国权,而是争民权,但吴佩孚的态度在发生了 180 度的转弯,不仅不赞成,而且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关键原因在于他是儒家专制秩序、等级观念的维护者,教育界的自尊、自立、自主的意识,在其看来当然是不守本分、思出其位了。而且武人的身份更强化了他政治思想观念的狭隘性,他甚至将办理学校等同于带领军队,完全不理解现代教育性质。持有这样的观念,那自然是将教育经费视为对教职员的施舍,而不是一个国家政权应尽的责任。北京政府也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处理教育经费之争的。

索薪运动中吴佩孚态度的转变,其实深层原因还在于处于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教育界与固守传统政治理念的军人政府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差异。随后围绕着英国退还庚款的用途之争,教育界与吴佩孚之间正式唱起了对台戏。

三、庚款之争中的吴佩孚

20 世纪初,美国首先退还庚款用作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在中国各界的争取下,英法等国也相继表示退还庚款的意向,中国朝野为此兴起了关于退还庚款的用途之争。中国教育界认为各国退还庚款也应该用在教育上,但各实力派军阀却另有打算。围绕着英庚款是优先用于教育还是优先用于筑路问题,教育界与筑路派曾经展开激烈的争夺。吴佩孚就是当时筑路派的主要支持者,与教育界公开唱反调;而教育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表示出对吴佩孚所属军阀群体的不信任。

教育界在最初的英庚款用途之争中是占得先机的,他们利用媒体宣传或其他社交手段,向国内外大力宣传庚款兴学,使庚款兴学的呼声在早期一度主宰了舆论导向。1924 年 7 月 24 日,全国教联会退还庚款事宜委员会通电,主张庚款全部用于发展中国教育

文化事业上，“认为国家根本之需要，惟在增进国民知识程度，庶进则于世界勉图贡献，退亦足以自保生存”^①。而且全国教联会十分关注英庚款退还问题，“从第五届年会开始，几乎每届都有关于庚子赔款的提案，特别是第十届年会通过了《庚款分配标准及董事组织原则案》”。他们认为庚子赔款的总额是按照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课罚一两赔付，所以退回时也应该退回至各省的义务教育，为全国的各个人谋幸福。中国教育界的活动对英国退款用途的意向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比如在中英庚款退赔的交涉中，英国部分人士对于庚款用途，呈递外交部的早期建议中，以主张发展英式教育的居多^②。英国政府的决定也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如1925年英国国会通过的《1925年中国赔款案》规定了英庚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或者其他事业。

但是当1922年英国声明退还庚款之后，建议英庚款用于其他用途的意见逐渐增多，其中以主张英庚款用于筑路声势最大最强，遂引发了庚款是优先用于筑路或治淮、还是优先用于文教事业之争。吴佩孚等实力派军阀是庚款筑路论的强力倡导者，他曾先后竭力主张用俄庚款修筑陇海铁路，用美英庚款修筑川汉、粤汉铁路，而且吴佩孚还迫使政府召开外交、财政、交通、教育四部会议具体商讨庚款筑路的方案。

吴佩孚倡议庚款筑路是振振有辞的，他并不直接反对庚款兴学，或者说他并不公开主张教育不如交通事业重要，但事实上他站在教育界的对立面，与教育界直接展开竞争。他在致公府与交通部的电文中指出，如果庚款只用于教育事业，那么庚款就会“随支随用，随用随消，不过取济一时，仍属无补久远”，所以“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不外惟生财货殖是图，而实际之巩固丰惠者，殆莫出铁路

① 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4年，第349页。

② 同上，第437页。